

## 贾克明<sup>①</sup>

地点：北京军区总医院

时间：1995年6月24日



贾克明

钟：很高兴您今天有时间，能够给年轻人讲一讲您当年留学日本的情况。

贾：我是恰恰在1937年从山西太原第一高中毕业，战争开始，没法升学了。我大哥在北洋大学，他思想比较进步，就从太原经西安跑到延安去了，走前对我说：把家留给你了。1938年，我到了北京，当时就剩一个燕京大学可以考，我报名急急忙忙地考。同学来告诉我考上了，并且是第一名，我去拿《世界日报》一看，上面写的是：“入文科者有贾克明

<sup>①</sup>贾克明，1919年生，山西太原人。1939年初到日本留学，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。1945年2月回国。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内科主任，肝病研究所所长。

等”。我想不对呀，我报考的是理科，我就到西郊燕大去看榜，一看是有我，转成文科了。我不怎么愿意，家里催我回家，我就放弃了上燕大。

我家有个背景：父亲是早年留日学生，母亲从小在日本生活，是华侨，住在长崎，后来去东京进了当时的女子大学。母亲有兄弟二人，各从当时的东京帝大法科和医科毕业。我父亲则是在民国初年，在东京高等师范学习，回到太原教数学。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一直是中国式的，母亲要教我们学一点日语，我们就是不学，我在学校里是学英语。我那时在家中滞留比较焦急，这人生的路子怎么走法？我相信学一点知识，将来会有用的。经家里亲戚劝，说同意让我去日本。这样凑了点钱，就去了日本。我去以前，母亲已经去世，我坐火车从太原到北京，到西城“教育总署”去办手续。我是以高中生升学身份去的，买了联票，经过丹东、釜山，一直坐到东京。

我去日本想考东京大学，如考不上就回来。到东京后，临时住在神田的“日华学会”。以后我认识了一位姓郑的同学，一同找到上野公园下面莺谷一个住处，两人有4席大小的房间，吃饭自理。那时是1939年初了，当时东京大学不能直接报考，他们不承认中国的学历。郑同学已经在金陵大学读过一年，也想考东大，我们就一起准备。只有先考一高，三年毕业后才能报考东大，而一高的入学考试除数学、英语等外，外国留学生必须加考日本历史。最使人头痛的是日本的上古史。我去“东亚学校”上了几天课，就不去了。水道桥的研数馆，我去了几次也不去了，我们两人自己学习准备考试。考试的结果，郑同学可能由于日本语文没有考上，翌年才考上，所以比我反而低一年。我考上，就进了特设高等科理乙，德文是第一外语。

在一高学习时，我觉得理科课程比较多，例如除了微积分、

物理、有机化学、无机化学、生物学外，还有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、地质、制图等。我在国内学数学是用美国课本，但教数学的老师荒又，用他自己写的课本，上下两册。记得有一次上课，是排列组合，我在下面算出来了，他不信，对我说：“你来，你上黑板给大家说一说。”我就上去给大家演算了一次，他说：“不错，很好。”

钟：能得到老师说好，不容易。

贾：我还记得一位微积分老师田中，头发已经白了。他问我：“你们中国学生里，那位姓宋的去哪儿了？”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同学，恐怕是前届的。他说：“我教的学生里，再没见过这样的学生，脑子太好了。”这话他感叹过好几遍。我们的课程中，每天都有德语。还学古文。古文中比如“仰之弥高”这个句子里，“之”字在中文里没什么特别意义，而日文解释是“这个”，就成为“你仰望这个吧，越望越高”的意思，比较细致。我在一高三年，留下印象很深刻，比上东大时还深刻。当时我们住在校内，叫做“自治”。我去的时候，穿黑袍的不多了，我没有穿过黑袍。我也常在星期天逛神田街的书店，看些文学、历史方面的书籍。我没有参加“读书会”的活动，我可能属于死读书类型的学生。

那时有同学被捕，便牵连一大片。我有个同学比较要好，姓温，东北大连去的，温同学常帮我制图。有一次他回家去了，过了一些天才回来，问我：“你的制图怎么样了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怎么样了？等你回来画呀。”他没有听课，就去看同学上交的制图作业，但已经锁在柜子里拿不出来，他用一个镊子捏出一张图来，看了看就说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然后就画出来了。我很佩服说：“真有本事”。但以后一下课就找不到他了。我追问他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？”他说：“我看电影去了。”我说：“一高学生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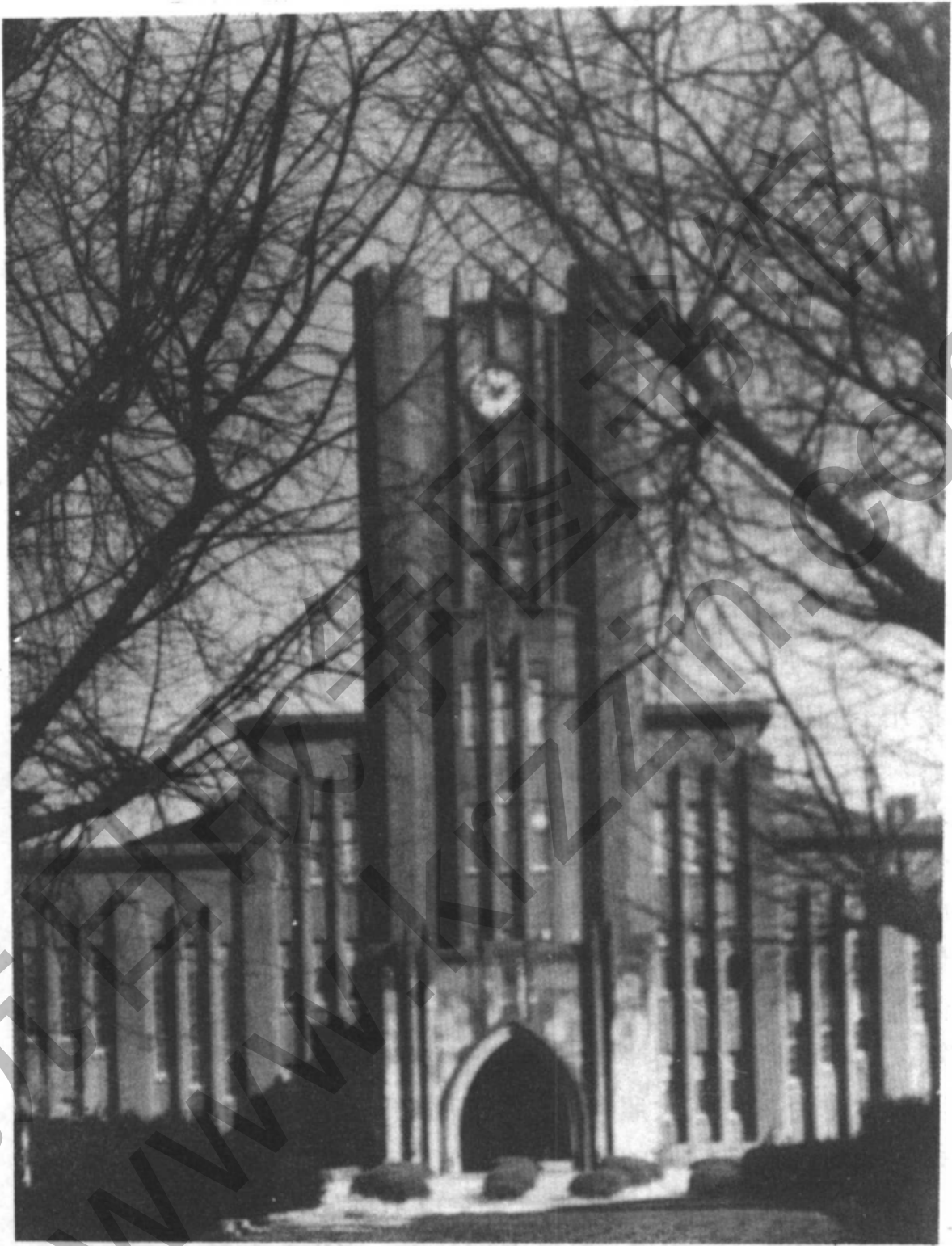
有看电影的，你到哪儿看电影去了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行，我有事。”我问什么事？他心情十分沉重但始终不说。后来他说：“我每次回到学校门外，都先从篱墙往里看一看，有没有汽车停在宿舍？有没有抓人的？没有车我才敢进来。”我追问他到底干什么去了，他总是说：“别说了。”我知道，秘密活动很复杂，有共产党的人，也有国民党的人。夏天放假，日本学生都回家走了，温同学对我说：“你不回去，我也不回去，咱们住一间屋子吧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他就搬到中寮宿舍，我们两人一屋。有一天早上天刚亮，学校里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是生徒主事老师，他很客气地敲门问：“温君在吗？”温同学一听就说：“在呀。”穿衣起来。主事说：“温君呀，‘那儿’有件事要向你了解了解，你去一趟吧。你把东西整理一下。”温就到对门自习室去整理自己的东西。我也就起来看，想送他到门口去。另一人是个便衣，回头很厉害地对我说：“怎么样？你也想去呀？”我一听就没有往前走，只听到汽车发动和远去的声音，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温同学。我回忆当时可能是在1940年夏季。那次一下就带走三个人（孙君、杨君、温君），太可惜，太令人愤恨。记得我入理科乙后不久，就有上级的中国留学生暗地告诉：在一高宿舍中要切记三个词：Schweigen Arbeiten Verbinden（德语：沉默、努力、团结），看来老一辈已有过血的教训了。

那时在军国主义统治下，共产党人被抓，国民党人也被抓，日本人民也被抓。在一高一年级时候，我住在明寮11号，有个日本同学叫长田三郎，大家一起学习。有一天，他忽然接到一份征兵通知，别人都没有被征，他就被征走了。几年前，已经相隔50多年，他突然写一封信给我，寄信地址是一个医院名。后来才知道他已哑不能发声，一直离不开医院了，只能住在里面。真像传奇一样。他告诉我，原来我在东大赤门前不远的菊

坂町寄宿的房子，竟是他姑母的房子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是他们从一高同学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，告诉长田的。他在信里向我打听一位姓徐的中国学生，我知道那人已经不在世了，我告诉了他。他来信说：为什么要打听这个同学？是因为那人向长田说过：“你呀，已经上了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了。”长田信上说：“这么多年，我总想明白为什么会征我去当兵呢？恐怕跟宪兵队有关系。”当时包括日本同学在内都被告知，当学生上课时，便衣宪兵会到宿舍搜查书籍笔记的。长田思想上左一点，当时爱谈论点什么。长田是广岛人，后来被英军俘虏，每天拿大镐去劳动，骨瘦如柴。当他在战俘营里听到广播，说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，离爆炸中心10公里内什么都没有了。他琢磨他的家怎么也不会有了，后来日本投降，英军把他释放出来时，给他一个纸口袋，里面只有几片面包。当时他体重只有36公斤。回日本后，这位理科学生毅然改学俄罗斯文学，毕业于早稻田大学，他的反战诗集《燕》，我一直保存留作纪念。长田三郎的父亲来过中国，受到宋庆龄主席的接见。他父亲写过一本书叫：《蘑菇云下的儿童》，岩波书店原版，我在中华书局见过中文翻译本。长田给我的信中有一段印象特别深，他反对日本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，他说：“这些人到现在还不了解什么叫做战争！我见过战争，在硫黄岛上，我见过。看着一个老太太带着个小孙子在路上逃，我叫她们快跑吧！我拿出仅有的一点干面包给她们，老太太一伸手，手上已经没有手指头了。她把吃的给小孩。我喊她们快走，走出去没有100米，一阵炮弹飞来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”

钟：您一高毕业就考东京大学？

贾：我考入东大医学部。当时如果去京都大学就不用考，可以免试。我想来想去，下决心考东大医学部。考前，前面所说



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

的一高数学教授荒又，从讲台上下来，一个个问学生：“你考哪儿？你考哪儿？”问到我，我说：“我考东大医学部。”他说：“好。这几年东大数学题不难。”

钟：数学题不难和考医学部有什么关系？

贾：最关键了。数学题最影响平均分数。我考试时，数学大题只有两道，头一题管 50 分，是积分题，已知圆的半径，问它所形成的 Paraboloid 的体积是多少？这题我算过好几遍了，答案都几乎记得，所以两题全答对了，德文也顺利。

我是在 1942 年秋季进入东京大学，一高虽然给了我一些好的底子，但东大教育方法似乎又不同，以自学为主。记得上生物化学课，我再用心也听不懂，只好去找德文原书来看，觉得挺清楚容易的，我才明白，大学教授讲课常是讲自己研究心得，各人自己去体会。老师要求是严格的，考试多是口试，用诱导方法来问学生。有一次考传染病和预防医学，老师田宫教授问我几个问题之后，又问：“你说一说这 Epidemiologie 原意是什么？”我回答说：“Epi 是在上，demio 是人群，群众的意思。所以在人群之上的病，也就是流行病。”他似乎很满意，说：“对。”他要打分数，翻开他的记分本子，看见我的名字，问我说：“你的名字怎么念？是念‘靠’还是念‘卡’？”我说：“念‘卡’。”他又问：“你是哪儿人？”我说：“中华民国人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们日本学生，再学也学不到你这样的。”中日邦交恢复以后，我随中华医学会代表团到东京癌中心去访问，忽然发现大厅中为首一张大照片，我惊问那不是田宫先生吗？他们告诉我说是的，是他创办的癌中心。

在一高时一次腿上化脓，怎么也不见好，那时还没有盘尼西林呢。校医也看不好，但很亲切关心，就给我写了介绍信，叫我去东大门诊，给我涂上刚出产的磺胺，伤口就好了。后来我

上临床，头一次听课，一看老师，那不就是给我治病的医生吗。他名叫冲中，现在东京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医院。现在日本的临床杂志《内科》，就是冲中教授创始的。

医院里的医生对我们实习医生要求极严，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他们都管，毫不客气。一年级学生都要学解剖，每年有一次解剖祭，对被解剖者去行礼，这个仪式在上野的一个庙里举行。老师在事前就很严肃地对我们说：“这件事你们必须记住，必须参加！”这是对病人的一种尊重。实习训练严格，附属医院病房中绝对不能随便说话聊天，但是医疗技术绝不保守，经常有经验交流。

医科本来应该是四年毕业，因为太平洋战争，变成三年半，这是东条英机的主意，要学生参军。我记忆是1944年秋末，有一天我在安田讲堂（东大礼堂）南边看到千人左右，是文科法科系统的全部东大学生，背着枪，被征入伍。他们称为“学徒出阵”，在军国主义下这些本来有为的青年绝大多数成为炮灰。我学习完了，参加医院里的救护，但我看看情况，认为军国主义末日已到，应该及早回去了，就在1945年2月回国了。

钟：从医学教育角度看，中国应该怎样去追赶呢？

贾：对日本学生的认真和谦虚精神要好好学习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我们学校缺乏校风的传统教育，看不远，缺乏严格训练。我还记得一次一个同学写“秋水仙碱”写错了一个字母，绪方教授就在讲堂上说：“你们看看，这都写错了，这还是东大的学生吗？”这批评好重的（绪方是现在日本医学杂志《医学之进步》的创始人）。我们就缺乏这种认真。

钟：作为现役军人，您对中日关系发展有什么希望？

贾：中日关系中是有问题存在的，只有自己先做好自己工作才能互相友好。友好是双方的事，你老去向别人借钱，这就



难办了。在能办到的条件下，双方应该加强理解。像我这个专业方面，学术交流也是一种互相理解。

钟：怎么能够理解得好一些？

贾：我觉得对日本应该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，我们对日本文化、传统，了解得太肤浅。我发现美国人对日本的调查研究很下功夫很彻底，例如 Donald Keene 写的《日本文学之历史》（中央公论社），以及《菊花与刀》等都比较深刻。日本人认为人死了都是神，中国人认为人死了都是鬼，这很不同，互相说不明白。从日本方面说，我看他们自己是应该很好清算一下历史，而日本至今没有做，这一点他们远不如德国人。他们对法西斯对军国主义的认识不如德国。像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<sup>①</sup>这样的书，很遗憾在日本就没有这种作者，包括日本历史学者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我曾经对日本人说过：“在打仗时候，你们和中国人较量过，你们同‘相扑’一样，觉得自己挺厉害。而中国人觉得‘太极拳’好，最后是‘太极拳’打败了你的‘相扑’，摔倒了。表面看是你厉害，但你必败在‘太极拳’下。”

我今年看到大江健三郎的一篇谈话。他问什么是现代日本人的道德准则呢？他认为第一条是应该是对世界人民负责，反对战争。果真如此，那么前面所述那位至死反核反战的长田三郎同学倒是够标准的。

钟：讨论还可以继续，问题在能够做点什么来理解？

贾：我自己是学医学的，但我也觉得近年我们在历史方面，也缺乏深刻的、有分量的代表作，我们也没有出现类似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那样的力作。日本的《大日本史》之类书籍，很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，美国记者威·夏伊勒（W·Shirer）著、1960年英文版，1979年出版中译本。其内容是描述德国法西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过程。

受中国《资治通鉴》的不良影响，我们不应当拿《资治通鉴》当史书看，那是一本封建政治书。今后我们应该有权威性的、在历史和文学上足以和《史记》媲美、并能够教育自己的中日问题的史书，那就好了。